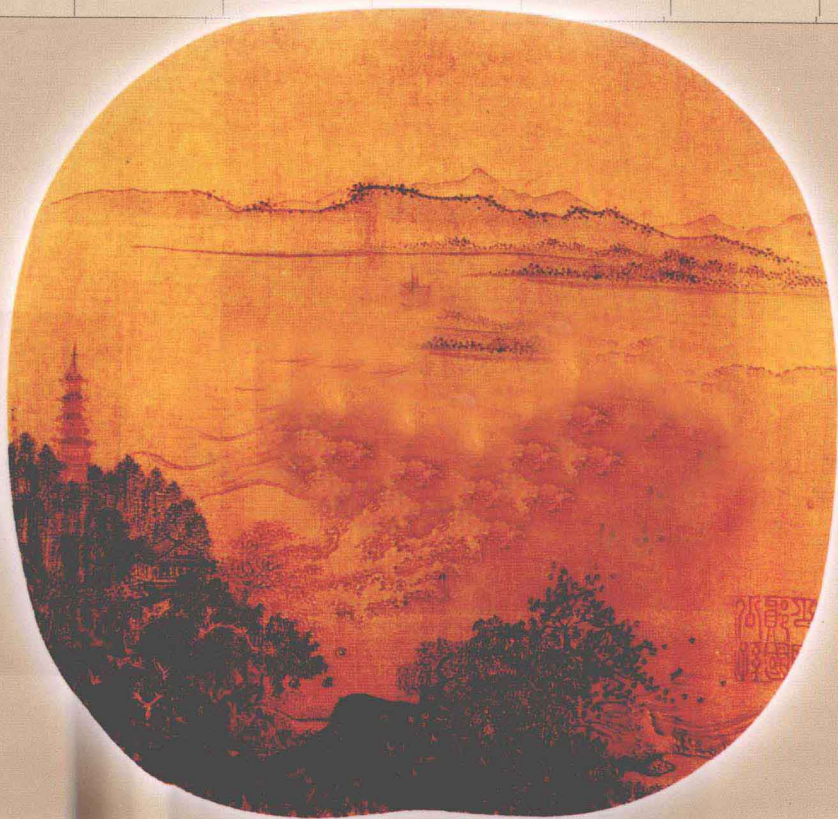


赵晖 宫淑芝 石滴水 著

古代文学散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古代文学散论

赵 晖
宫淑芝 著
石滴水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学散论/赵晖,宫淑芝,石滴水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07-4864-1

I. ①古… II. ①赵… ②宫… ③石…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961 号

责任策划:马银川

责任编辑:马银川

封面设计:张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省英华印刷厂印刷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6.5 印张 153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言



每一个教师,都希望把最准确、最科学的知识传达给自己的学生。然而在教学实践当中,常常遇到或被学生问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是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甚至今后也很难有定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学生,也困扰着教师。于是我们努力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搜集点滴滴的证据,条分缕析,力求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从而教给学生一个方法,引导他们凡是遇到古书中的问题,就必须从古代典籍中寻求答案,有了古书的依据,才能做到既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盲从前贤的结论,但也不主观臆断,而是有自己的见解。比如“昭君出塞”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自汉朝以来,多少文人墨客都以极大的热情颂扬这位巾帼英雄:宋朝刘子翬《十古图·明妃出塞》诗就说昭君的功劳堪比讨伐匈奴的名将卫青、霍去病,而清朝葛秀英《题明妃出塞图》诗则说昭君和亲的功效完全超过了兴兵讨伐取得的功效,就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仔细审阅《汉书》的记载,就知道昭君和亲之后匈奴之所以没有大举进犯汉朝,主要是汉武帝以来对匈奴实行摧毁性打击的结果。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昭君的功绩,又不宜过分夸大其功绩。再如《诗经》这部书,是在孔子之前已有定本,还是由孔子删定的;如何正确



评价秦始皇“焚书坑儒”……都需要贯通古今，耐心地从古书中搜寻答案。

还有一些问题，其实也算不上是问题，只是一些文学现象，因为题材较小，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我们把它们整理出来，让大家欣赏，意在告诉大家，其实小题目也可以做成大文章。小题大做在于“巧”，希望对某些写古代文学论文的人有启迪作用。如收在本书的《成群花衣女，翩翩百花丛——论中国古代的咏蝶诗》、《琐末小虫，为害天下——论中国古代的咏蚊诗》两篇文章，即把吟咏两种小昆虫的优秀诗篇搜集出来，美丽蝴蝶的可爱、卑琐蚊虫的可憎，让人们在熟知的事物中领略诗人们的才气，同时也加深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

本书共收 14 篇文章，书中既没有惊人之语，更非鸿篇巨制，只是我们多年的教学、科研所得，包含着我们孜孜追求真知的心血。敝帚自珍，不揣浅陋，诚请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3 年 5 月 8 日

目 录

诸子与子书	(1)
孔子删诗应有其事	(5)
“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从《庄子》的语言中窥视庄子的生死观	(16)
竹帛不随秦史冷 ——谈秦始皇“焚书坑儒”	(28)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简论中国古代的隐士和隐逸文学	(47)
昭君泣别与女儿哭嫁 ——评历史上的昭君出塞	(100)
鲁迅论嵇康	(114)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境界及其成因	(125)
成群花衣女,翩翩百花丛 ——论中国古代的咏蝶诗	(132)
琐末小虫,为害天下 ——论中国古代的咏蚊诗	(144)
世间不可磨灭文字 ——读郑板桥家书十六通	(155)



古文注释质疑四则	(171)
戏补王筠的自嘲语	(178)
安贫乐道,志存高远	
——谈读书、做学问	(181)





诸子与子书

“诸子”与“子书”，是学习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学经常遇到的概念。如现在一般文学史书，都把秦朝以前的散文著作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大类。那么，什么是诸子？什么是子书？这些名词是怎么来的？各指的是什么？许多初学者还弄不明白。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古代文学的发展线索，兹将这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子书”一词的由来

诸子和子书的“子”字，其本义是对所生男女的通称。后来引申为“人之嘉称”，变为某些男子专有的美称。凡所谓有道德、有学问、有爵位的人皆称“子”。如古时候的士大夫就通称“子”，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称“君子”。又，古时候“政”、“教”是合一的，官就是师，师同时也是官，故也称师为“子”或“夫子”。到了春秋晚期，学术开始由私人传授，于是弟子们便将他们所奉的老师说的话称为“子曰……”，又把老师的著作作用“子”题名，如《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



等。后人把这类书籍统称为“子书”，这便是“子书”的由来。这里需要知道的是，秦以前的子书大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之作。如《论语》里辑录的言论就不全是孔丘的话，有些是他的弟子的话。《庄子》书中的“外篇”和“杂篇”就不是庄周本人写的。许多子书都是以题为书名的人的著作作为主罢了。

二、“诸子”一词的由来

到了战国末叶，奴隶制度结束，封建制度确立，学术思想也到了“破旧立新”的时候。批判和总结以往的学术思想，建立适应新制度的新学说，成为许多学者治学的目标。这就出现了《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等这种学术批判总结的专著。而就在这两篇文章里开始把“诸子”并提。到了汉朝，司马谈著《论六家之要旨》，刘歆作《七略》辑子书为《诸子略》（今已佚），于是“诸子”的名称正式成立。

这里应注意的是，“诸子”一词既指一系列自成一家的学术论著，又指这一系列学术论著的作者。在前一种意义上，“诸子”和“子书”的含义相同，而“子书”绝不能作后一种意义的理解。“子书”指的是书，不是人。

后人对周秦学术界又有“诸子百家”的说法。这种说法始自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后来的刘歆、班固及今人吕思勉等又作了发展。“诸子”作为一系列学术论著的作者，是指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臆、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



等。所谓“百家”，是由诸子各自不同的政治学术主张而形成的学术流派。可见，“诸子”和“百家”紧密相连。发展到后来，人们往往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用“诸子百家”统称周秦时期的学术思想派别。其实，当时的学术流派没有“百家”之多，“诸子百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此外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

三、诸子和子书的范围

我们一提诸子和子书，一般主要是指先秦诸子。但东汉初年的大史学家班固，依据刘歆的《七略》撰成了《汉书·艺文志》，《艺文志》中的《诸子略》把两汉许多人的著作也作为诸子和子书同先秦诸子并列在一起。例如，他把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等多人及其著作列为儒家，把晁错等人及其著作列为法家，等等。这就使诸子和子书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先秦诸子。南朝梁的大文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这部巨著中专写了《诸子》，认为汉魏六朝时期某些人的著作也应当“归乎诸子”、“入诸子之流”，于是后来才有了“汉魏六朝诸子”之称。晋朝荀勖编定的图书目录《新簿》把当时所有的书籍分为经、子、史、集四大部类（东晋人李充又改定为经、史、子、集次序），把诸子书归为“子部”，但“子部”里的书并不都是诸子书。因此，“诸子”或“子书”便一直是某一特定书群的固定的专名。这样一来，今天所说的“诸子”或“子书”，就包括先秦诸子和汉魏六朝诸子，或称之为先秦子书和汉魏六朝子书，意思是一致的。这些子书各有哪些呢？流传至今的先



秦诸子有：

《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尹文子》、《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孙臧兵法》、《吴子》、《吕氏春秋》等。

传至今的汉魏六朝诸子有：

《新语》(汉陆贾)、《新书》(汉贾谊)、《淮南子》(汉刘安)、《盐铁论》(汉桓宽)、《法言》(汉扬雄)、《论衡》(汉王充)、《说苑》(汉刘向)、《申鉴》(汉荀悦)、《潜夫论》(汉王符)、《政论》(汉崔嘉)、《昌言》(汉仲长统)、《抱朴子》(晋葛洪)、《世说新语》(宋刘义庆)、《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等。

先秦子书，主要是指先秦时期各学派的学术论文。这类文章的重点是阐发某一学派的哲学思想，所以先秦诸子散文又称为“哲理散文”。诸子散文，特别是先秦诸子散文，其特点是“有所为而发”，很少“无病呻吟”之处。班固说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和社会见解提出种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为了合乎人君、诸侯的需要，企图解决当时最基本的政治问题，故在文章中都有“破”有“立”。诸子文章一般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说理透彻，文气奔放，战斗性很强；又多用譬喻和寓言，文章均丰富多彩。



孔子删诗应有其事

孔子是否删过诗？即是说，《诗经》一书是否由孔子编定？学术界争论了千余年之久，迄今没有定论。当今尽管多数学者对此问题持否定意见，但仍有一些专家，特别是几位资深专家力主孔子删过诗，《诗经》一书是由孔子编定的。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学术界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的《诗经》学里，对于《诗经》诗歌的来源和编集成书问题，一向有献诗、采诗和删诗诸说。前两说无大问题，本文不去谈它。这里要谈的是被许多人怀疑和否定的孔子删诗说。孔子是否删过诗？从现存的文献看，早在西汉就有孔子删诗的说法，最早把这种说法记录下来的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对司马迁的这一重要记载，后来的班固、欧阳修、朱子发、郑樵、周子醇、王应麟、马端临、赵坦、王崧等都相信和支持。而唐朝孔颖达则开始提出疑问，后来又有朱熹、叶适、朱彝尊、崔述、方玉润、魏源、李惇等许多人怀疑或反对。当今学术界除了杨任之、金景芳等少数学者相信和支持司马迁的记载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不可信”、“难以成立”，是“荒诞无稽的”。他们坚持这样的观点：《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由周朝的乐官把采集来的诗歌进行筛选、整理和加工，逐步编定的，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定本。大学里使用的多种文学史教材，几乎都持这种说法，《诗三百》非孔子删编，几成定论。特别是张恩富先生，在他的《国学简史》里，以不成其理由的“理由”，用判决的口气，宣判了孔子删诗说的“死刑”：“孔子当年并未删诗，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从此不复存在。”^①但我们认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多属揣测臆度之辞，对这个问题仍有钻研和讨论的必要。

不承认孔子删诗的人们有哪些理由呢？

首先，最重要的理由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载的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唱的各国风诗和雅、颂的编排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当时孔子才8岁，不可能删诗。据说这是“最能证明孔子不曾删诗”的“更重要的反证”，“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无法驳倒、不可争议的最有力

^① 张恩富：《国学简史》，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的证据”。这条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今本《诗经》的祖本《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就定型了。那么是谁编定的呢？他们说周王朝的乐官（太师）把采集来的诗歌进行筛选、整理和加工，逐步编定的。但我们认为不能拿这条材料来证明《诗三百》的编定在孔子之前，因为这条材料本身就有问题，不可信。

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孔子修成《春秋》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可是到了唐代，赵匡提出受经作传的左丘明和《论语》中的左丘明不是同一个人，使传统的《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说法受到怀疑。其后，王安石、朱熹、托名郑樵者等许多人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左传》是战国人所作。到了现当代，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朱东润、赵光贤等学者，以更丰富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考证出《左传》成书于战国年间。如卫聚贤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 425 年到前 403 年之间^①，杨伯峻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 403 年到前 386 年之间^②，徐中舒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 375 年到前 352 年之间，赵光贤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 450 年到前 432 年之间^③。而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教授更指出《左传》里季札游鲁观乐那段文章是战国后期人写的：

季札观乐一段文字本是战国人作，故其所作豫言无不准确。按札之聘鲁为公元前 544 年事，而为之歌陈，

① 参见卫聚贤：《古史研究》，新月书店 1928 年版，第 77 页。

② 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01 页。

③ 参见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6 页。



曰：“国无主，其能久乎？”楚惠王之灭陈在前 478。为之歌郑，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韩哀侯之灭郑在前 375 年。为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晋献公灭魏为前 661 年事，季札时已无魏国存在，有之则晋六卿之魏氏耳。“明主”，《史记·吴世家》引作“盟主”，此则当为前 403 年周威烈王命魏斯为诸侯后事。魏惠王后元年（前 334 年）与诸侯会于徐州以相王，方有此盟主局面。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按吕尚固为太公，田和亦是太公，周安王命和为诸侯在前 386 年，齐威称王在前 352 年，齐宣伐取燕在前 314 年，此殆所谓“国未可量”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按季札之世，最大之国为晋、楚，秦僻居西隅，不与中原之会盟，何以称为“大之至”？秦之强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始，其事在前 359 年，得魏河西地在前 330 年，惠文称王在前 325 年，其灭巴、蜀在前 316 年，取楚汉中地在前 312 年，拔韩宜阳在前 307 年，秦昭王称西帝而致东帝于齐湣王在前 288 年……而上距札之聘鲁已 250 余年矣。当公元前四世纪之末，三世纪之初，秦齐为东西两大国，谓之“大之至”与“未可量”非夸辞也。而魏自惠王以来，霸权凌替，如无“德辅”则必不得为“盟主”，故为之兴忧虑以提高其警惕矣。时代标帜清楚若此，而读者迄不悟其非札言，何耶？^①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228 页。



这段考证文字,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切中要害,无可辩驳地揭穿了季札观周乐时的众多预言“非札言”,而是那段文章的作者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替季札所作的预言。即使整部《左传》不是成书于战国时期,而是成书于春秋末年,“季札观乐”一段也是战国后期人增窜的文字。该段文字中的预言所杜撰的都是季札听乐歌的感受,既然这些感受和预言不是季札的,那么《左传》所记鲁国乐工为季札所演唱的《诗三百》的分类篇目和先后次第是否如《左传》所记,就很微妙了,不见得是季札所听到的那种分类篇目的先后次第。战国中后期,经孔子删汰编定的《诗三百》已经很流行,《左传》所记的季札听乐的分类篇目和先后次第极有可能是作者为杜撰预言而按照他所看到的孔子删编本《诗三百》的分类篇目和先后次第记述的。因而我们不能用这条材料来证明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诗三百》的编定本,从而否定孔子删诗说。

发现《左传》的作者常借他人之口作预言,不自顾颉刚先生始,古人早就察觉了。如清朝初年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就在《日知录》卷四里著有《左氏不必尽信》条,指出“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传》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所举的例子就有季札聘鲁观周乐事。后人因此认为《左传》的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见的。顾炎武和顾颉刚等人对于季札聘鲁观乐一文的考论,未见有谁提出异议,但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不被文学史家所采纳,反而这条不可靠的材料却总是被拿去证明《诗三百》的成书在孔子之前,孔子未曾删过诗。而一些相信和坚持孔子删诗说的学者对此也总是避而不谈。郭沫若先生曾说: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加有害。^①

否定孔子删诗的再一理由,是说在孔子出生之前,各国通行的乐歌集大体已有三百篇之数,在三百篇之外并未从其他古籍中发现多少类似的逸诗。这个理由是由前一个理由连带而来的,不知其根据是什么。在孔子出生前的古籍,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周易》和《尚书》等很少几种,这几部书里没有提到《诗三百》。在孔子出生后产生的书,较早的《老子》未谈到《诗三百》。《墨子》虽然有“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但墨翟是晚于孔子约一百年的人,《墨子》一书又是由墨翟的学生编撰的,其成书年代已是战国中期了。其他再有提及《诗三百》的先秦古书都晚于《墨子》。这些古书中说的《诗三百》都在孔子删汰、整理、编成的《诗三百》流行之后,完全可以认定就是指的孔子的删定本。可是有些学者竟把这作为《诗三百》编定于孔子之前的证据,甚无道理。同样,若据此就说在孔子前各国通行的乐歌集大体已是三百篇之数,也甚无道理。孔本《诗三百》流行之后,未入选的质量差些的古诗很快就会消亡,这是在《三百篇》之外的其他古籍中很少有这类逸诗的原因。

否定孔子删诗的又一个理由是,孔子晚年曾对鲁大师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